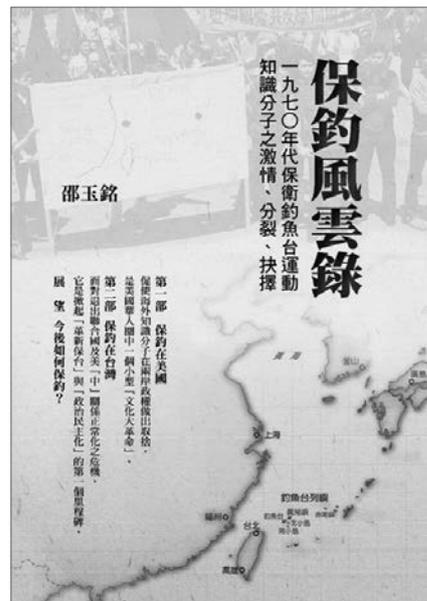


美國華人知識界的「小文革」

——評邵玉銘《保釣風雲錄：一九七〇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

● 梁加農



美國的保釣運動是海外華人知識份子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之一，深深影響了海內外的知識青年。邵玉銘時在芝加哥大學，是美國保釣運動全程的親歷者。四十年後，他依據長期積累、觀察的資料寫成了專書《保釣風雲錄》。

邵玉銘：《保釣風雲錄：一九七〇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1970年，中日發生釣魚台列嶼（中國大陸通稱「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包含釣魚台、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和北小島及周

圍的若干岩礁）主權爭議。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及部分美籍華裔學者、香港和澳門留學生，以及在加拿大的台灣留學生，群情激憤，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以下簡稱「保釣運動」）。1971年1月29至30日、4月9至10日以及1972年5月13日，先後在美國華盛頓、紐約、舊金山、洛杉磯、芝加哥、波士頓等七大城市爆發了有數千人參加的示威遊行。1972年5月15日，美國政府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託管釣魚島的行政權歸還日本，而對其主權不持任何立場。美國的保釣運動就此結束。

美國的保釣運動是海外華人知識份子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之一，深深影響了海內外的知識青年，而且薪火相傳，延燒不盡。1971年保釣運動在美國興起後，台灣島內的大學生不顧長期實施的「戒嚴令」，走上街頭示威遊行，前往美國、日本大使館遞交抗議書，刺激了知識份子思想的開放及其後

的「革新保台」、政治民主進程。保釣活動也傳到香港，綿延迄今。而中國大陸後來居上，2012年一度在大中城市爆發過大規模的保釣示威遊行，再次引起海內外矚目。

1970年代保釣運動初起時，在美國有台灣留學生兩萬餘人，還有數以千計的美籍華裔學者及香港、澳門留學生，其中不少人都不同程度地參加了保釣活動，包括楊振寧、何炳棣、陳省身、王浩、田長霖、李遠哲等著名學者。東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西岸舊金山外的柏克萊加州大學、中部的芝加哥大學是保釣運動的三個中心。邵玉銘時在芝加哥大學，是美國保釣運動全程的親歷者，後回台灣擔任過大學教授和政府新聞局局長。四十年後，他依據長期積累、觀察的資料寫成了專書《保釣風雲錄：一九七〇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以下簡稱《保釣》，引用只註頁碼）。

《保釣》一書分為兩部分，即保釣在美國和保釣在台灣，結尾為展望和總結。該書不是一部保釣運動全史，重點放在對保釣運動中知識份子當時及其後問政言行的檢討，以及對整個保釣運動的評價。作者在書中對保釣運動的評價以及所反映的立場，本文姑不置論。這裏只圍繞書中〈序言〉所說，在當年美國華人知識份子圈中，保釣運動可謂一個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一如中國大陸的文革，也是一個「觸及靈魂深處的革命」（頁10），將《保釣》中佔篇幅最多、作者親

歷的保釣在美國的一些第一手史料過錄如下，略加討論。

一 保釣運動的左轉

1971年保釣運動在美國興起後，國際風雲變幻。4月，美國乒乓球隊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7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秘密訪問北京及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宣布將於翌年訪華；11月，聯合國通過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驅逐台灣的決議，台灣海峽兩岸「東風壓倒西風」。保釣運動隨之發生左轉，與兩岸政治掛鉤而與保釣本身漸行漸遠。大部分參與保釣的學生因此離開了此一運動，留下的又進一步分裂為擁護大陸和擁護台灣的左右兩派。

1971年8月，美國東北地區共四百多名留學生在布朗大學舉行美東國是大會，出現一邊倒的局面，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的決議案，決議並說「文革可說相當成功，如已鬥垮走資路線的當權派，改革了教育與文藝，更希望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總之，文革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社會主義發展到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9月，四百多名留學生（半數來自台灣）在密西根大學舉行安娜堡全美國是大會，也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國人

《保釣》一書重點放在對保釣運動中知識份子當時及其後問政言行的檢討。書中指出，在當年美國華人知識份子圈中，保釣運動可謂一個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一如中國大陸的文革，也是一個「觸及靈魂深處的革命」。

1971年9月，四百多名留學生(半數來自台灣)在密西根大學舉行安娜堡全美國是大會，設有戴紅袖章的糾察隊，唱《東方紅》、唸《毛主席語錄》。對個別不唸、不唱的，群起而攻之，若非懼於美國的法律，怕是早就「武鬥」了。

民的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決議(頁64-65)。

中國大陸文革中習見的「文鬥」場景，其時也出現在美國華人知識界。安娜堡大會設有戴紅袖章的糾察隊，唱《東方紅》、唸《毛主席語錄》。對個別不唸、不唱的，群起而攻之，「不唱《東方紅》、不唸《毛主席語錄》，就是反毛，反毛就是反華，反華就是漢奸，漢奸人人可以誅之」(頁71)；當會中有人發表不同立場時，連糾察也加入制止行列，「你是不是中國人？」、「你這種人就是奴才！」、「滾出去」(頁69)。若非懼於美國的法律，怕是早就「武鬥」了。會上的報告人全是清一色左派，完全照搬中國大陸的說法，如朝鮮戰爭是由南朝鮮在美國支持下侵略北朝鮮，1958至1960年的大躍進是一大成功，人民公社的成就不可否認，等等。會上的討論也往往強詞奪理，如有人提出：中國大陸這麼好，為甚麼還有那麼多人冒死逃往香港？回答是：那些逃港者都是「垃圾」(頁68)，「畫報上大陸人民都是胖胖、笑咪咪的，絕不會吃不飽」(頁77)；又如討論台灣經濟時，說「開發台灣應完全拒絕外資，不必做理論上的爭辯」(頁68)。一些反感這一套的學生，包括邵玉銘、沈君山等，離開大會後，另行組織了右派的「反共愛國會議」與左派對抗(頁89-93)。

此外，1971至1974年訪問過中國大陸的一些著名學者，回到美國後撰文或講演，為文革叫好，認為「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一切法

令措施幾無一不以貧下中農和工人的福利為準繩，無一不暗合羅爾思[John Rawls]的立法標準。與其他國家和社會比較，新中國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新中國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文革是必要的』。……文革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頁107-109)，也進一步推動了美國華人知識界的左轉。

與對中國大陸、對文革高度評價形成對照的，是一些在美國的留學生及學者對台灣的全面否定。保釣運動在美國最有影響的刊物、柏克萊加州大學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油印的《戰報》第2期(1971年6月1日)，把台灣比作妓女，「因美日嫖客的小惠而雀躍起來，對外以『經濟繁榮』來掩飾這一齣醜劇」(頁61)。〈安娜堡全美國是大會記錄〉謂台灣淪落到「美、日半殖民



《戰報》第2期(圖片由 Don Tow 提供)

地的經濟地位」，「貧民問題日趨嚴重」(頁71)。還有諸如「台灣婦女當中被環境所迫而當妓女的比例，佔世界最高位。大陸上沒有妓女」(頁88)，「台灣工人備受剝削，上不足以養父母，下不足以養子女。可是大陸上的工人階級就不同了……工人們不愁吃不愁穿」(頁87)等等對台灣的無端批評。

1970年代初，中國大陸尚未開放，沒有學生在美國留學。那些在美國參加保釣活動的留學生及學者都來自台灣、香港和澳門，部分年長的學者來自1949年前的「舊中國」。以常理看，他們受過現代高等教育，又生活在資訊開放、言論自由的社會，當屬先進的知識份子，學養、見識都應卓越，至少不會偏離常識。為何卻令人難以想像地表現得與長期受「階級鬥爭」教育、成長在資訊封閉、言論單一的中國大陸文革時期的「紅衛兵」一般？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二 愛國主義還是機會主義？

著名歷史學者高華曾分析過一名在文革中逃亡蘇聯的北京大學畢業生的偏激言論和矛盾思想，如對收留了他並給予良好人道和物質待遇、沒有把他遣送回中國去受極刑的蘇聯，沒有一絲感激之情，反而建議「凡主張中蘇友好者，應以漢奸論處」；明明被國內極左環境壓迫得走投無路而亡命蘇聯，也承認

蘇聯比中國文明進步，「還容許人性的存在，而中國把所有人的人性都消滅光了」，卻在國外為國內某些極左方針和理論辯護，在中蘇論戰中為中方加油，稱讚中國批判蘇聯內外政策的「九評」文章；跟着國內的文革論調，大罵流亡蘇聯的原中共領導人王明是「奸賊」而熱愛中國的「偉大的領袖」等。高華認為那是因為該名外逃者作為一個「無國籍」人士，在蘇聯到處被監控；中國搞文革又有家不能回，內心辛酸和煎熬；加上畢竟是知識份子，與為了活命的普通外逃者不一樣，還要追尋「生活的意義」，於是「自大的愛國主義」便成了他安身立命的防禦性的武器①。

但是，那些在美國的華人知識份子的情況與這位逃亡者不同。雖然也有個別人士因在美生活遭遇挫折、「受了美國佬的氣」，而以政治認同來肯定自我，不過從《保釣》一書的記載來看，這類人不具普遍性和代表性(頁160)。畢竟，不要說與極左路線下的中國大陸相比，就是比起蔣介石父子威權統治下的台灣，美國的總體生存環境也更好。當年在台灣的知識份子都說，一想到大陸的大饑荒、文革，對台灣所受的一切都原諒了，「內心的一切都化解了」②。此外，或謂在美國的華人知識份子受了西方「新左派」理論的影響。只是「新左派」當年在美國學術界仍屬少數派，而且參加保釣運動的知識份子大多數屬理工科系(頁156)，不大可能受人文領域晦澀難解的「新左派」思潮影響。

在美國參加保釣活動的留學生及學者當屬先進的知識份子，為何表現得與長期受「階級鬥爭」教育、成長在資訊封閉、言論單一的中國大陸文革時期的「紅衛兵」一般？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對於美國的華人知識份子，愛國主義的解釋也有局限性，尤其是以作者強調的「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標準來衡量，那些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左派，寧可蝸居在「壞」的美國，也不肯回到中國大陸，成為「好」的一部分。

《保釣》引用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泳的話，嘗試用一種更「高級」的愛國主義來解釋，即這些有識之士，不是一點也沒有察覺中國的實際情況，而是「家國情感超越事實判斷，統一意念妨礙知識分析，資訊阻塞導致背離常識，輕信國家強大，產生民族幻想」（頁157）。不過，這一愛國主義的解釋也有局限性，尤其是以作者強調的「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標準來衡量的話，那些遠隔重洋跟着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左派，寧可蝸居在「壞」的美國，也不肯回到中國大陸，成為「好」的一部分。雖然各人不回去的具體情況不同，但統計數據顯示的基本史實就是如此。

暫且不論1976年文革結束、中國改革開放後的不同情況，僅從文革後期的1971至1976年看，從美國前往中國大陸定居的台灣留學生不到十人（頁138），其中有的後來又回了美國，如陳若曦夫婦。還有一些懷着「朝聖」的心情去過中國大陸的左派人士，驚訝地發現大陸「原來是這樣的落後和無理性」、「人活得不像人」，於是立場轉變，有的從政治回歸文學，有的認同台灣，甚至更進一步不再講政治，對國家統獨、分合問題漠不關心，只要過程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就行（頁114-20）。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同一時期回到台灣的留學生，1971年有197人，1972年有367人，以後每年平均維持300至400人左右。1979年美國與台灣「斷交」，當年回台的仍有359人（頁140）。

《保釣》作者當年曾就此問題請教過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鄒對保釣運動中左傾學生的激進言行並不感到意外，說「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最大的特點是『投機』」。許多知識份子確實是「感時憂國」的正人君子，但也有許多是政治上的投機份子，隨着政局的轉變而轉換立場，1940年代後期民主同盟中即有此種人士，並說吳晗是值得研究的個案之一（頁81、216）。這不禁令人想起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在1961年所說，民主黨派中一些人「逢迎貪鄙之情態，殊可鄙也」^③，以及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費孝通、錢鍾書訪美時，語及因寫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在文革初被整後慘死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時，錢對費說的「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④。

當代中國思想家李澤厚曾指出，與德國傳統精神中的那種盲目衝動的非理性主義（譬如納粹運動及日耳曼種族優越論）不同，文革這場看來似乎是失去理性的瘋狂的「革命運動」，卻並非完全是非理性的產物，其主體仍然是以普通理知為基礎的，儘管其中有某些類似宗教狂熱的成份，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瘋狂破壞、虐待酷刑等，但基本上仍具有普通理知上的可接受性^⑤。從對中國一些地方文革史的實證研究，我們也可以看到文革參與者的某些機會主義或實用主義特徵，包括那些捲入的大批大中學校學生和青年教師也不例外。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董國強近年對南京

文革史的研究顯示，參與者都從實用主義的考量出發，運用許多激進的革命修辭和姿態，做出有利於自身利益的詮釋和發揮，抬高自己、抹黑對手，這是文革期間掩蓋了背後利害攸關的派性鬥爭本質的一個基本策略^⑥。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王紹光在1990年代完成的武漢文革史研究中，通過對幾十個文革參與者的訪談，涉及為甚麼參加文革、在多大程度上捲入了派性鬥爭、在甚麼條件下訴諸「武鬥」、何時退出運動等問題，認為從一個縱深的角度來觀察，在高喊革命的表象下，這些參與者實際上是理性的、有目的的，根本目的就是改善他們的生活境遇，而且往往採取利用形勢「搭便車」的策略^⑦。

只是機會主義也好，實用主義也罷，還主要是從外部環境加以解釋，雖然都是言之有據的通達之論，不過似乎還可以進一步探究其內在原因和特定意義。近幾十年國際學界對知識份子思想史的研究顯示，一些知識份子之所以出現激進言行，並不完全與客觀外界的條件相關，還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

三 「人有病，天知否？」

據《保釣》一書所言，1971年曾有人傳話到美國，轉告周恩來總理的話說：「《戰報》的字要寫大一點，毛主席眼睛不好，看得很辛苦。」（頁28）此事不見於中國大陸

的文獻，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傳（1949-1976）》和《毛澤東年譜（1949-1976）》都未有披露有關史料，現在還無從印證毛是不是看到了《戰報》以及看後有何評論。可知的是，彼時的毛，不但在內部談話中說「特別喜歡右派，尼克松一類人」^⑧，而且在外交上向右轉，與美國和解、與日本建交，並擱置了釣魚島主權爭議。

1972年9月中日建交談判時，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提出的釣魚島主權問題，周恩來回答：「本次不想談。現在談這問題不好。因為發現石油，這就成了問題。如果沒有發現石油，台灣和美國都不會把它當回事。」（頁102）其後中國政府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長期奉行擱置爭議方針，包括1978年10月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在東京記者招待會上回答有關釣魚島主權問題時說：「……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下一代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頁103），實肇始於此。

1973年冬，毛澤東囑咐身邊工作人員把自己的全部詩詞謄抄了一遍，並作校改。其中作於1923年的《賀新郎》原詞中的「重感慨，淚如雨」改為「人有病，天知否？」高華曾對此加以解讀，認為「此『病』似病又非病也，病者，有待改造的人性之痼疾」^⑨。雖然，「詩不宜註」，但至少可以姑備一說；而且此前不久，根據毛的指示，中央為

鄧謙對保釣運動中左傾學生的激進言行並不感到意外，說「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最大的特點是『投機』」。許多知識份子確實是「感時憂國」的正人君子，但也有許多是政治上的投機份子，隨着政局的轉變而轉換立場。

派泊斯對二十世紀初俄國激進知識份子做過深入考察。他列出其中的激進表現和特徵，在文革和保釣運動中也似曾相識。一些知識份子之所以出現激進言行，並不完全與客觀外界的條件相關，而主要是他們在自己的小圈子內互相激盪所造成。

全黨幹部開列的學習馬列書目中，就有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⑩。

曾長期在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俄國史的派泊斯(Richard Pipes, 又譯派普斯)，對包括早期列寧的二十世紀初俄國激進知識份子做過深入的考察。他列出其中的激進表現和特徵，在文革和保釣運動中也似曾相識。例如這些激進知識份子的真理標準不是生活實際，而是創造出他們自己的世界，這一世界只接受他們自己認可的檢驗標準；他們無視客觀事實，任何據理爭辯者都要「滾出去」；組織或圈子內的共識不是靠思想興趣的分享來達成，而是通過統一思想，嚴肅紀律，輔之以對內部成員裏一切不同思想者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派泊斯的研究結論是，一些知識份子之所以出現激進言行，並不完全與客觀外界的條件相關，而主要是他們在自己的小圈子內互相激盪所造成^⑪。

事實上，二十世紀初俄國激進知識份子的這種特徵還可上溯到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激進知識份子。1760至1770年代，法國興起了一批追求「先進」的「思想沙龍」(sociétés de pensée)，包括各類文學社團、學會、共濟會分會及「愛國」團體。與俄國一樣，法國知識份子傳統上也被排斥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受抽象理論的影響更甚於生活現實。這些沙龍有一定的入會手續和會規守則，知識份子在其中互相激盪，日益激動和偏頗起來，往往傾向激進的意

識形態。十九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中就注意到此類現象。他指出，在英國，提出國家治理理論的知識份子和具體執行國家治理的行政官僚是合作共處的，後者依實際操作的經驗對前者的理論加以調整而使其具體化；而在法國，兩者卻是分離的，各說各話，理想社會出自知識份子的想像，一切都是那麼簡單、統一、和諧、平等和理性^⑫。用法國歷史學家科切(Augustin Cochin)的話說，就是與英國的社會變化出自憲政機制不同，法國是起於文學和哲學沙龍，其結果必然導致雅各賓一類的激進主義(Jacobinism)^⑬。

從《保釣》也可以看到知識份子在自己的小圈子內互相激盪造成激進言行的例證。當年在安娜堡大會上表現激進的一名左派學生多年後便說：「因為上台就要跟右派比高下，一定要火力猛烈，寸步不讓，『不然下台後會被大家批判，說仗沒有打好』；結果是『祖國好，要說得更好；台灣有一分不好，要說成十分……』」(頁79)這實際上也完全偏離了美國式左派(即自由派，Liberals)對萬事看法不取非白即黑的絕對態度的基本立場。另一位當年在美國積極參加過保釣運動的學生多年後反思時引用托克維爾的話說，「錯在我們對一種烏托邦式的均衡境界的徒勞無功的追求。這種境界，如果真的實現，才更為可怕」(頁121)。美國保釣運動後不過幾年，在1975至

1979年間，以托氏故國昔日留學生中的少數激進份子波爾布特(Pol Pot)、英薩利(Ieng Sary)等為核心的紅色高棉，一度據有中國的南部鄰邦柬埔寨的全國政權，實現「烏托邦式的均衡境界」，把一個祥和的佛教社會變成了可怕的人間殺戮場，為托氏的話提供了一個歷史的腳註。

耐人尋味的是，波爾布特等人的政治生涯也始於法國沙龍，或稱「學習小組」(Cercles d'Etudes)。1950年代初，在巴黎的柬埔寨留學生中的十幾二十來個「進步學生」，包括後來紅色高棉政府總理波爾布特、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英薩利、國防部長宋成(Son Sen)、衛生部長秀臣(Thiounn Thioeunn)、社會部長喬蒂麗(Khieu Thirith，後嫁給英薩利)和婦聯主席喬奔娜麗(Khieu Ponnary，後嫁給波爾布特)姐妹，每周聚會一次，學習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著作，議論國家大事，「對如花之美眷，聽說劍之雄詞」，由此確立了激進的革命人生目標^⑭。他們在柬埔寨掌權後，革命激情之高，行動之絕，完全不受外界影響；不要說前朝國王，就是出錢出槍、一手把他們推上台的「老大哥」中國，也在其政策選擇上說不上話^⑮。

凡此種種，或許也可謂一些知識份子之「病」吧？雖然不一定會是毛澤東原意的「人有病」，但也可以套用當年毛的話說，「此種頑症，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獨有」^⑯。而且在左派崇敬的導師毛澤東看來，「左傾」也會像病一樣發作的，

「不曉得哪一天要『左傾』起來」^⑰。在毛寫下「人有病」前一百多年的1858年，即托克維爾去世一年前曾對一位友人說，他從法國大革命中察覺到某種特別的病症，但還未能描述和分析其根源，這是人類社會裏一種新的、尚不熟悉的「病毒」^⑱。十八世紀從法國開始出現的帶病毒的「革命新人」困惑着晚年的托克維爾。雖然托氏此「病」並不就等於毛氏彼「病」，卻似乎都可以視為某種「人性之痼疾」。

在中國大陸全面否定文革、大量披露「黑暗面」多年後，一些當年在美國積極參加過保釣運動的知識份子反思說，「釣運現出了它和文革的可懼的近似，近似到使人後來可以說，好在是在美國，否則摧殘已經執行，生命已經被毀滅了」(頁115)，「運動後來產生很大的弊病，跟人性本身有關」(頁122)，「也許只有再等待幾代的文化累積，不是政治運動，才能見到中國人的氣質改良」(頁115)。

四 小結

依《保釣》作者多年在美國的觀察，無論是來自台灣還是香港的留學生，其實大多數並沒有太強的意識形態取向，他們大都準備畢業後在美國落地生根(頁77)。具體地說就是拿「3P」，即Ph.D(博士學位)、P. R.(永久居留證)、Property(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又向蠻方作寒食，強持卮酒對梨花」，在

十八世紀從法國開始出現的帶病毒的「革命新人」困惑着晚年的托克維爾。雖然托氏此「病」並不就等於毛澤東彼「病」，卻似乎都可以視為某種「人性之痼疾」。一些當年在美國積極參加過保釣運動的知識份子反思說，「釣運現出了它和文革的可懼的近似」。

那些思想左傾、熱心政治、表現激進的只是美國華人知識份子中的少數。《保釣》一書留下他們在保釣運動的特定歷史背景下演繹「美國版」文革、發作某些「人性之痼疾」的記錄和思考，為研究者考察「原版」文革中的一些問題提供另類的參考史料。

新大陸自由自在地過小康舒適的日子。

在1970年代參加過保釣運動的學生中，也有許多回到台灣，絕大多數從事與政治無關的專業工作。他們為社會進步和民主進程做出了積極貢獻（頁141）。還有不少在美國學有所成後，幫助中國大陸和香港發展教育和慈善事業，如1980年代由私人集資設立的科技教育協會和滋根基金會，支助最邊遠、最貧困的貴州、廣西農村教育（頁149-50）。著名院校香港科技大學的創立，從美國回港的吳家瑋、錢致榕、孔憲鐸等前幾任正、副校長均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頁143-48）。

至於那些思想左傾、熱心政治、表現激進的只是美國華人知識份子中的少數。《保釣》一書為後人留下這少數人在保釣運動的特定歷史背景下，演繹「美國版」文革、發作某些「人性之痼疾」的記錄和思考，或多或少可為研究者考察「原版」文革中的一些問題提供另類的參考史料，也為一般讀者豐富了有關海外華人和知識份子的歷史面像，是本書最具學術價值的內容。

註釋

① 高華：〈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雷光漢的《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蘇聯流亡記》〉，載《歷史筆記》，卷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379-86。

② 王鼎鈞：《文學江湖：在台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煉》（台北：爾雅出版社，2009），頁432-33。

③ 參見吳宓：《吳宓日記續編》，第五冊（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60。

④ 參見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文匯讀書周報》，1999年1月2日。

⑤ 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載《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頁197。

⑥ 董國強：〈派性身份、個人處境與政治抉擇：從地方視角反思文化大革命〉，《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4年6月號，頁44-54。

⑦ 王紹光著，王紅續譯：《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x-xii、4。

⑧⑩⑬⑭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442；340；485；475。

⑨ 高華：〈讀毛澤東詞《人有病，天知否？》〉，載《歷史筆記》，卷二，頁197-201。

⑪⑮⑯ Richard 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 129; 130; 132.

⑫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Stuart Gilber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5), 138-47.

⑬ Philip Short, *Pol Pot: The History of a Nightmare* (London: John Murray, 2004), 64-65.

⑭ Andrew Mertha, *Brothers in Arms: Chinese Aid to the Khmer Rouge, 1975-197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2-3.

梁加農 加拿大麥格納公司工程師，
六西格瑪 (Six Sigma) 黑帶。